

“台湾病”的生成机理 与演化趋势

——基于产业极化与地缘依附的双重视角

盛九元 郭瑞昭

【内容提要】 在全球产业链重构与地缘政治博弈加剧的背景下，台湾经济呈现出宏观总量繁荣与微观结构失衡并存的悖论。特别是近期受全球 AI 算力需求驱动所引发的短期宏观高景气，进一步掩盖了其深层的结构性危机。本研究将此定义为“台湾病”，并基于产业极化与地缘依附的双重视角，系统剖析其生成机理与演化趋势。通过构建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M）并结合长周期产业数据，研究证实了电子产业对传统产业存在显著的资源挤出效应与非对称调整机制，这种“无根化”的单点增长不仅未能产生技术外溢，反而加剧了“创新孤岛”与财富分配的极端断层；与此同时，地缘政治压力迫使核心产业链以投资替代和缴纳“地缘政治税”的形式向外转移，导致内生阻滞与外生扭曲相互强化，加剧恶性循环。当前“繁荣叙事”难掩单一支柱的脆弱性，若不重构多元化产业生态、纠正要素配置扭曲并回归务实的两岸地缘经济策略，台湾经济恐将在透支财政与社会撕裂中，陷入长期停滞与空心化的深渊。

【关键词】 “台湾病”；产业极化；地缘依附；经济空心化

【作者简介】 盛九元，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郭瑞昭，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 F127.58；F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6683（2026）02-0141-20

在后疫情时代的全球经济版图中，台湾经济的表现不俗。据台湾地区统计部门的数据，2025 年台湾 GDP 增长率高达 8.68%，创 15 年来新高，在“亚洲四小龙”中独占鳌头；人均 GDP 达到 39477 美元，连续两年超越日本与韩国；与此同时，失业率持续走低，从 2021 年的 3.95% 降至 2025 年的 3.33%。从表面上看，台湾经济发展似乎标志着典型的高技术驱动型经济体走向成熟与繁荣。然而，从更深角度分析来看，台湾地区经济发展展现出截然不同的“寒意”：台湾地区资产排名前 100 的集团 2023 年营收与利润均较 2022 年出现明显衰退，创下历史最大跌幅，传统制造业营业利润 2023 年较 2022 年衰退七成，且尚无止稳趋势，劳动力市场深陷“高薪半导体”与“低薪服务业”的二元断层。

这种宏观层面上经济发展数据的亮丽与微观层面百业发展所面临的困境，构成了当前台湾经济最为矛盾的悖论。主流经济学理论常以“荷兰病”来解释某种单一繁荣部门对其他部门的挤出效应，^① 但台湾当前面临的困境远比经典的“荷兰病”更为复杂和凶险：不仅包含因半导体产业一枝独秀导致的生产资料（电力、人才、土地）极度倾斜，更叠加了特殊的地缘政治因素——外部霸权力量对核心产业链的强制性迁移与收割。英国《经济学人》杂志 2025 年末发表的重磅文章指出，台湾由于政策诱导的偏差造成经济功能的结构性失调，患上了“台湾病（the Taiwanese Disease）”，^② 基于此，本研究沿用“台湾病”的概念，将“台湾病”定义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由于过度依赖单一高科技产业，在内部资源有限与外部地缘政治高压的双重约束下，导致的产业结构畸形极化、传统经济造血功能坏死、社会财富分配断层以及经济主权依附化的综合症结。

通过对产业数据、外部环境及内部瓶颈的实证分析，笔者尝试系统解构“台湾病”的生成机理，探讨在这一病理机制的作用下，台湾经济究竟是处于持续增长的快车道？还是正在滑向长期停滞与“空心化”的深渊？

① 李军林、王麒植、姚东旻 《产业结构与经济风险——来自“荷兰病”的模型分析》，《人文杂志》2016 年第 2 期，第 25-32 页。

② “The Hidden Risks in Taiwan’s Boom,” *The Economist*, November 13, 2025, <https://www.economist.com/leaders/2025/11/13/the-hidden-risks-in-taiwans-boom>.

一、“台湾病”的病理表征

在全球科技竞争加剧、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的背景下，台湾经济发展似乎步入了快车道，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中成为了不可或缺的一环。但从更深入的角度来看，宏观总量的亮丽表现主要源于半导体产业的一枝独秀，这种高度集中在单一产业的成长模式遮蔽了其他传统制造业的广泛性衰退与内部需求的动力不足。台湾经济结构正从多元协同的“雁行模式”退化为高度依赖单一产业的“K 型”分化结构。

（一）“增长极”的回波效应与资源虹吸

依据佩鲁（Perroux）的增长极理论，主导产业应通过产业链关联产生扩散效应，带动周边区域与产业共同发展。^① 然而，半导体产业作为台湾当前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其回波效应已显著压倒扩散效应，各类资源向单一产业过度集聚，对其他产业的生存空间造成了挤压。根据中国台湾地区半导体协会公布（TSIA）的数据来看，台湾地区 2024 年 IC（集成电路）产业整体产值达 53151 亿新台币，较 2023 年增长 22.4%，^② 占台湾地区当年生产总值的 20.86%，占出口约 40%。2023 年半导体行业下滑 15.4% 时，导致制造业整体下跌 12.7%，显示整体经济抗风险能力差。2025 年二季度，台积电在全球晶圆代工中的市占率达到 70.2%，首度超过七成，^③ 稳居龙头地位，同时也进一步扩大在台湾整体制造业中的占比。

与高科技产业的景气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传统支柱产业的全面萎缩。根据台湾中华征信所的调查显示，2023 年台湾百大集团总营收为 34.7 万亿元新台币，较上年度减少 9.7%，创下历史最大衰退幅度；税后纯益总额为 2.3 万亿元新台币，同比骤减 31.4%，为 2012 年以来最严重的衰退。在百大集

① Perroux F., A Note on the Notion of Growth Pole, *Applied Economy*, Vol. 2, 1955, pp. 307-320.

② 王逸芯 《台湾 IC 业大爆发！上季产值飙 1.5 兆、2024 全年上看 5.3 兆》，台湾《中国时报》2025 年 2 月 18 日，第 4 版。

③ 中国半导体论坛 《中芯国际全球第三！台积电市占首超 70%！》，<https://www.eet-china.com/mp/a443909.html>。

团中，有 62 个集团的营收净额出现下降。^① 逾八成受访公司首席执行官表示，企业长期存续面临压力，其中运营成本上升风险占比 22%，颠覆性科技带来的风险占比 16%，地缘政治风险占比 14%，供应链布局调整风险占比 12%。根据台湾工业生产统计的数据（表 1），台湾地区制造业整体指数 2025 年上升至 113.12，呈现出扩张态势，但其主要归功于资讯电子工业的极端拉动（133.99）。整体来看，台湾制造业呈现出极端的“K 型”分化趋势。一方面，受全球 AI 算力需求驱动，电脑、电子产品及光学制品业指数飙升至 218.70；另一方面，占据制造业大多数就业岗位的金属、化学、纺织等行业指数普遍衰退至 70-80 区间。资讯电子业的高速扩张产生的资源虹吸效应，导致要素价格（电力、土地、人力）上升，进一步恶化了传统制造业的生存环境，也反映出传统制造业正经历着难以逆转的结构性衰退。

表 1 台湾地区 2021—2025 年制造业工业生产指数

行业类别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2024 年	2025 年
制造业	制造业整体	整体	100.00	98.04	85.49	95.97	113.12
	金属机电工业	整体	100.00	93.85	84.27	85.12	85.64
		基本金属业	100.00	85.89	77.86	77.45	73.17
		金属制品业	100.00	90.14	81.18	84.94	87.52
		电力设备及配备业	100.00	96.03	87.61	92.91	95.67
		机械设备业	100.00	96.67	80.57	83.78	88.19
		汽车及其零件业	100.00	101.35	102.87	96.38	88.59
		其他运输工具及其零件业	100.00	111.56	85.16	79.93	79.54
		产业用机械设备维修及安装业	100.00	111.65	117.55	113.71	131.22
	资讯电子工业	整体	100.00	101.52	85.66	103.50	133.99
		电子组件业	100.00	100.82	83.27	99.72	124.36
		电脑、电子产品及光学制品业	100.00	108.40	109.28	139.81	218.70
	化学工业	整体	100.00	93.12	85.30	85.58	84.17
		皮革、毛皮及其制品业	100.00	98.79	80.76	83.73	78.53
		纸浆、纸及纸制品业	100.00	93.78	88.19	90.02	86.93
		印刷及资料储存媒体复制业	100.00	102.20	96.87	99.08	91.96

① 台湾中华征信所 《2024 年台湾大型集团企业研究》，2024 年。

续表 1

行业类别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2024 年	2025 年
制造业	化学工业	石油及煤制品业	100.00	106.22	102.04	101.78	102.16
		化学材料及肥料业	100.00	86.64	76.45	75.87	73.67
		其他化学制品业	100.00	95.17	88.49	91.46	92.85
		药品及医用化学制品业	100.00	106.75	112.34	102.62	100.87
		橡胶制品业	100.00	94.08	77.86	77.20	75.52
		塑胶制品业	100.00	92.55	82.65	86.32	85.71
	民生工业	整体	100.00	95.15	88.81	90.56	89.86
		食品及饲品类	100.00	102.42	102.41	106.96	108.16
		饮料业	100.00	97.33	94.77	92.37	93.94
		烟草业	100.00	95.48	95.40	86.33	85.85
		纺织业	100.00	90.55	69.93	75.23	71.24
		成衣及服饰品业	100.00	95.59	76.51	75.63	68.46
		木竹制品业	100.00	89.50	80.95	84.65	78.00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100.00	93.25	87.94	90.18	89.99
		家具业	100.00	85.68	74.66	84.34	74.30
		其他制造业	100.00	87.14	77.85	77.66	78.97

（二）利润集中与涓滴失效

梅利兹（Melitz）所构建的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表明，高效能企业通常有更多进入出口市场的机会，且通常能获得更多资源。^①然而在台湾地区，这种异质性已演变为极端的两极分化。高技术部门的超额利润被锁定在资本闭环内，未能通过产业链条传导至劳动力市场，导致“涓滴效应”失效。

据中华征信所发布的《2024 台湾大型企业排名 TOP5000》报告数据，台湾企业的经营绩效呈现出显著的结构断层。在全样本 5000 家大型企业中，仅有 22.14%（1107 家）实现了营收与获利的双重增长，^②绝大多数企业处于衰退状态。通过对企业的产业属性的分析发现，台湾经济的增长动能出现

① Melitz M. J. , The Impact of Trade on Intra-Industry Reallocations and Aggregate Industry Productivity, *Econometrica*, Vol. 71, 2003, pp. 1695-1725.

② 颜真真 《台湾前 5000 大企业公布! 台积电续居获利王 广达重回营收前 10 强》, *NOWnews*, <https://www.nownews.com/news/6462894>.

了明显的路径偏移：传统的出口导向型高科技产业成长乏力，取而代之的是内需型产业的补偿性复苏。数据显示，房地产、运输观光、汽车及电力供应四大内需或特许行业占据了百强席位的 75%；相比之下，作为台湾长期经济支柱的电子制造产业群仅有 10 家入围，网络设备、被动元件等关键细分领域均未上榜。反映出台湾经济的核心增长极——电子产业集群面临着普遍的增长停滞。然而，在增长动能趋缓的同时，利润分配却呈现出极高的集中度与垄断性。从 2023 年税后纯益前十大企业的构成可以看出，半导体及电子制造相关企业依然维持着绝对的获利能力。具体来看，台积电以约 8385 亿元新台币的税后纯益稳居榜首，其获利规模约为第二名鸿海精密（约 1421 亿元）的 6 倍，更达到第三名联发科（约 770 亿元）的 10 倍以上。获利前五名的门槛已抬升至 600 亿元，且主要由半导体双雄（台积电、联电）及大型金控集团所占据。这种“高获利存量”与“低成长增量”的结构性背离，证实了台湾半导体产业已形成极高的进入壁垒与利润鸿沟。超额利润高度集中于台积电等少数具有技术垄断地位的头部企业，形成了封闭的资本循环体系，不仅无法有效惠及产业链中下游的中小企业，也未能通过产业链的垂直关联传导至更广泛的劳动力市场，造成“无增长、低毛利”的内卷化困境，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下降。

产业结构的失衡直接映射到劳动力市场的回报率上，展现出了典型的两极分化特征。根据台湾地区的薪资与生产力统计数据，过去 20 年间，电子产业受雇员工每月平均薪资增长超 100%，而部分如汽车及其零件制造业的平均薪酬在 20 年间的增长仅为 1.3%。^① 若将通胀因素纳入考虑范围，部分传统制造业员工每月薪酬的实际购买力甚至呈现出负增长态势。高科技产业虽然推高了整体 GDP 的增长，但由于其资本密集型的特征决定了其就业吸纳能力的局限性。绝大多数劳动力被长期锁定在低增长、低附加值的传统服务业与制造业中，导致社会财富分配出现严重断层，形成了富裕的财政数据与贫穷的微观体感之间的巨大落差。彭博、布鲁金斯学会的学者将这种现象描述为“死于成功”。

^① 台湾地区经济统计部门 《薪资统计查询系统》，https://earnings.dgbas.gov.tw/view_payroll.aspx。

（三）地缘政治下的投资替代与产业空心化

在全球半导体需求高涨的背景下，台湾最核心的资本与技术资源却呈现出一种“非自愿性外流”的扭曲状态。这不是基于市场效率的全球布局，而是在特定地缘政治压力下发生的、以削弱本土产业根基为代价的“投资替代”，资本配置出现系统性扭曲，产业结构呈现出加速空心化的趋势。过去 30 年，台湾半导体产业积累了全球最密集的半导体供应链集群、高素质且用工成本相对较低的工程人才以及成熟的制造工艺，构成了台湾地区在全球半导体产业链中无可替代的比较优势。然而，自 2020 年以来，美国以国家安全为名推动供应链“在地化”，并通过关税、补贴、法规等多重手段要求台湾关键企业赴美投资，导致台湾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被动式产业外移”。^① 2026 年 1 月，台美达成关税协议，美国以将对台商品关税降至 15% 为条件，换取台湾半导体等高科技企业至少 2500 亿美元的新增直接投资和同等规模的信用保证，其核心条款直指台积电，要求其将至少 40% 的先进制程产能转移至美国本土。^② 这并非是企业基于成本与供应链考量的自主选择，而是企业为规避极端政治风险而缴纳的“地缘政治税”，决策逻辑已从“利润最大化”异化为“风险最小化”。由此产生的“投资替代效应”，直接挤占了本应用于升级岛内成熟制程、更新老旧基础设施以及投资下一代量子技术的资金空间。当资本发生地转移至美国，对于台湾而言，留下的仅是账面上的利润汇回（且往往被用于海外再投资），而非岛内经济活动增量与就业机会。

更为严峻的是，此轮产业转移呈现出致命的“去核心化”特征，直接威胁到台湾地区的产业根基。区别于以往将纺织、组装等低附加值环节外迁的“腾笼换鸟”式升级，当前台湾先进制程的外移正在改变台湾半导体产业的结构基础。据台媒披露，台积电需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再建 4-5 座先进晶圆厂，^③ 加上此前承诺的 6 座晶圆厂和 2 座先进封装设施，将形成涵盖晶圆制造、封装测试的完整半导体园区。这一布局意味着台湾引以为傲的“硅盾”

① 董龙 《大国科技竞争下台积电的产业权力嬗变》，《台湾研究》2025 年第 5 期。

② 王平：《民进党当局的“精神胜利法”》，《人民日报》（海外版）2026 年 1 月 27 日，第 4 版。

③ 箫雨 《台积电将大幅增加在美投资再建至少五座芯片工厂》，凤凰网，<https://tech.ifeng.com/c/8psBONAN08R>。

正在经历“切香肠”式的物理分割。美国通过“产业链迁移+技术留置”的制度设计，彻底锁定台积电的核心资产。在技术层面，美国通过“投资换技术”的潜规则，逼迫2纳米、1.4纳米等更先进制程的同步转移。当高附加值环节被剥离，留给岛内的将仅剩高能耗、低毛利的制造环节，导致台湾制造业面临实质性的“技术空心化”威胁，这不仅削弱了台湾的制造能力，更切断了未来技术创新的内生动力，使台湾面临着从“科技中枢”退化为“代工节点”的结构性风险。

二、“台湾病”的生成机理

（一）技术外溢效应的弱化与“创新孤岛”的形成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经济的长期动力源于知识积累与技术创新，而主导产业的核心价值不仅在于其自身产出，更在于其“知识扩散源”的能力。根据Romer和Lucas的内生增长模型，知识积累和技术进步具有“非竞争性”与“正外部性”。^①在理想模型中，核心部门的技术突破通过供应链扩散、人才流动及知识传播，提升全社会的全要素生产率。^②然而，以半导体产业为核心增长极的台湾却呈现出相反的趋势，半导体产业的极度繁荣并未形成普惠式的技术外溢，其尖端技术被禁锢在极少数企业的内部循环中，形成了与本地经济相对割裂的“创新孤岛”，导致内生增长机制出现系统性阻滞。半导体代工模式的“垂直专业化”特性，内生地抑制了横向技术扩散。台积电开创的晶圆代工模式，使得台湾半导体产业成为全球半导体产业链中重要的一环。而由于半导体产业的技术密集、资本密集以及规模效应的基础特性，使得台积电等代工企业高度依赖经济全球化，^③也使得其产生的知识多为高度专有化的隐性知识，具有强烈的“场景专用性”，难以被标准化

① 朱勇、吴易风：《技术进步与经济的内生增长——新增长理论发展述评》，《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1期。

② Lucas R. E. , On the Mechanism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Vol. 22, 1988, pp. 3-22.

③ 李巍、李珂译：《当超级企业遭遇地缘政治——中美战略竞争中的台积电》，《国际展望》2024年第5期，第1-27页。

并转移至其他制造业领域，导致半导体产业的先进技术如同被封装在“黑箱”之中，其技术路径与本地传统产业的升级需求之间缺乏有效的嫁接接口与转化通道。技术外溢效应的弱化，导致创新成果无法成为整体经济的增长引擎。

与此同时，台湾产业结构固化进一步加剧了创新体系的断裂。由于长期依赖代工模式，台湾企业普遍缺乏原始创新与系统整合的能力，研发投入高度集中于半导体制造环节，在资源总量约束下，半导体产业的高回报率对全社会的研发资源产生了强烈的挤出效应。依据台湾地区经济统计部门数据（表 2），电子零组件制造业与电脑电子产品及光学制品业的研发投入长期占据制造业总投入的 80% 以上。相比之下，涉及广泛就业的机械设备、化学材料及民生工业，其研发投入占比合计不足 20%，这种极端的资源倾斜导致了“创新的马太效应”。资本市场的逐利性使得资金源源不断地流入台积电、联发科等头部企业，而传统制造业因缺乏资金注入，陷入“低研发投入—低附加值—低利润”的低水平循环。最终的结果是，台湾虽然整体研发强度较高，但剥离半导体后，实体经济的创新活力实则处于萎缩状态。这种“单点式创新”模式使台湾难以形成跨产业的知识溢出网络，创新生态呈现出“链条短化”与“节点单一化”的特征，难以支撑整体经济的持续增长。

表 2 2014—2023 年台湾制造业历年研发投入

年份	总投入 (百万元 新台币)	电子零组 件业 (百万元 新台币)	占比	电脑电子产品 及光学制品业 (百万元新台币)	占比	其他制造 业总计 (百 万元新台币)	占比
2014 年	413401	220985	53.46%	111801	27.04%	80573	19.49%
2015 年	413311	213660	51.69%	116361	28.15%	83290	20.15%
2016 年	459133	238599	51.97%	122889	26.77%	97645	21.27%
2017 年	486987	260020	53.39%	129371	26.57%	97593	20.04%
2018 年	530626	295253	55.64%	130469	24.59%	104904	19.77%
2019 年	558143	306878	54.98%	132871	23.81%	118394	21.21%
2020 年	567965	306956	54.04%	139109	24.49%	121899	21.46%
2021 年	634431	363157	57.24%	148681	23.44%	122594	19.32%
2022 年	821563	507049	61.72%	171667	20.90%	142847	17.39%
2023 年	855619	518477	60.60%	182707	21.35%	154435	18.05%

数据来源：台湾地区经济统计部门《工厂校正及营运调查》。

Lucas 的人力资本模型强调,人力资本的积累与多样性是经济增长的关键。^①然而,台湾当前面临着严重的人力资本“单一路径依赖”。为满足半导体产业发展的人才需求缺口,台湾高等教育体系大规模向 STEM(科学、技术、工程、数学)领域倾斜,且课程设置高度定制化服务于晶圆制造与 IC 设计。2024 年统计数据显示,半导体相关专业招生缺口仍达 27%,AI、量子计算等前沿领域师资缺口超 40%,这迫使其他理工科专业进一步缩编以为半导体产业人才培养提供资源。以工程及工业系、信息通讯系、数学统计学系为例,毕业生从 2016—2017 学年的 7.8 万人减少到 2019—2020 学年的 7.04 万人,减幅接近 10%。^②这种人才配置的极化导致了严重的“人才荷兰病”。当顶尖理工人才几乎被半导体大厂垄断,传统制造业即便有转型意愿,也面临招不到顶尖人才的困境。这不仅扼杀了其他产业的发育空间,更加剧了整体经济面对单一产业周期波动时的脆弱性。

(二) 鲍莫尔病的变异与“无就业增长”

Simon Kuznets 认为,随着经济发展,劳动力将自动从低生产率部门向高生产率部门转移,从而实现全社会人均收入的均等化提升。^③然而,台湾经济的演进轨迹却背离了这一良性路径,陷入了“鲍莫尔成本病”的一种恶性变体。在经典的鲍莫尔模型中,进步部门的高工资会拉动停滞部门的工资上涨,虽引发通胀但能改善分配。^④但台湾地区所呈现出的并非是经典意义上的“成本病”,而是一种更具结构性破坏力的“变异鲍莫尔病”,高生产率部门的增长无法吸纳足够就业,而低生产率部门的就业占比持续扩大,却缺乏生产率提升的能力,最终形成“有增长无就业,分配不公平加剧”的结构性困境。

台湾半导体产业的增长模式属于典型的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随着摩尔

① 连玉君《人力资本要素对地区经济增长差异的作用机制——兼论西部人力资本积累策略的选择》,《财经科学》2003 年第 5 期。

② 柴逸扉《台湾科技产业缺工的背后》,《人民日报》(海外版),2021 年 9 月 1 日,第 4 版。

③ Kuznets S., “Modern Economic Growth: Findings and Reflection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63, 1973, p. 253.

④ Baumol W. J. and Bowen W. G., *Performing Arts: the Economic Dilemma*, Aldershot: Ashgate Pub Co, 1996.

定律的推进，产出的增长越来越依赖于昂贵的资本设备投入，而非劳动力的增加。根据台湾地区经济统计部门的数据，过去二十年电子零组件业营收增长超过 129%，但就业人数仅增长约 44.7%。^① 高科技产业的扩张并未带来相应的就业机会，使得经济增长与劳动市场改善出现结构性脱节，形成典型的“增长无感”现象。与此同时，该部门的高利润率与高薪资，通过要素市场抬高了全岛的土地、电力及高阶人才成本，对用人规模更大的传统制造业与内需服务业形成了成本挤压效应，从而异化了传统鲍莫尔模型的界定：并非是停滞部门因成本上升而挤压进步部门，而是高产值、低就业的资本密集型进步部门通过抬升全要素成本，加剧了真正容纳大量就业的停滞部门的生存困境。

其最终导致台湾经济发展过程中呈现出畸形的“二元就业结构”：一极是规模有限、高薪高产的半导体及紧密相关产业，贡献了经济增长的绝大部分增量；另一极是规模庞大、低薪低增长的传统制造业和生活性服务业，吸收了社会绝大部分劳动力，却陷入生产率停滞、利润微薄、薪资增长乏力的困境。产业结构演进并未遵循配第-克拉克定律实现劳动力的有序转移，而是出现了“结构固化”的现象，这表明“库兹涅茨曲线（Kuznets Curve）”倒 U 型结构在台湾的失效，经济增长不再自动修复收入差距，反而因要素回报率差异而固化了阶层鸿沟。经济增长的福祉通过“利润集中”与“成本传导”两个渠道，严重扭曲分配机制，使得资本利得和少数高阶人力资本获得了绝大部分增长收益，形成了“生活成本向高科技看齐，工资收入向低端服务业看齐”的现象，导致工薪阶层的相对贫困化，加剧了社会结构从“橄榄型”向“K 型”撕裂。

（三）比较优势的地缘政治扭曲

赫克歇尔-俄林（H-O）要素禀赋理论认为，经济体应基于其相对丰裕的生产要素（如劳动力、资本、技术）参与国际贸易，通过专业化生产并交换，最终实现全球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改进。^② 台湾之所以能成为全球半导体

^① 台湾地区经济统计部门：《经济统计数据分析系统》，<https://service.moea.gov.tw/EE521/common/Common.aspx?code=G&no=3>。

^② Ohlin B., *Interregional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3.

制造中心，正是凭借其独特的要素组合——高度集聚的半导体产业集群、高素质且成本相对较低的工程师红利、以及极低的内部交易成本，成为基于市场理性与比较优势的典型案例。然而，“台湾病”最深层的病理，正体现在其赖以成功的经济理性根基逐步被地缘政治系统性侵蚀与替代。美国对台湾半导体产业施加的“脱钩断链”压力与“在地化”要求，并非基于效率提升的市场行为，而是“逆比较优势”的强制性操作，这种非市场力量的介入，强行切断了资源配置与禀赋优势间的高度关联性，导致台湾最核心的高级生产要素面临被暴力剥离，其长期竞争力根基遭遇釜底抽薪式的威胁。

传统的产业转移是基于边际成本上升的市场选择，符合比较优势动态演进的规律。^① 依据理性厂商理论，企业的区位选择应遵循成本最小化与供应链效率最优原则。^② 然而，台积电在美国投资决策则背离了这一原则。台积电创始人张忠谋曾指出，在美国制造芯片的成本比台湾高出 50% 以上。这种成本溢价并非源于技术落差，而是源于美国缺乏成熟的产业工人、高昂的劳工与法规合规成本以及支离破碎的本地供应链生态。从全球经济福利的角度看，将产能从高效率区域强行转移至低效率区域，导致了显著的帕累托效率损失。这种违背 H-O 理论的资源配置，实质上是企业被迫缴纳的高昂“地缘政治税”，不仅没有创造新的经济价值，反而通过增加无谓的生产成本，人为耗散了台湾制造业数十年积累的制造效率优势。当经济决策变量中，“政治合规”的权重超过了“生产效率”，产业发展的路径将被彻底扭曲。

波特在竞争优势理论中区分了初级要素（如土地、普通劳动力）与高级要素（如专业人才、核心技术、复杂产业集群）。^③ 区别于过往将初级要素密集环节外迁以腾挪空间发展高级要素密集环节的规律，台湾半导体产业外移呈现出明显的“空心化”特征，其本质是台湾被迫输出了其最稀缺、最核心

① 刘新争 《比较优势、劳动力流动与产业转移》，《经济学家》2012 年第 2 期。

② 杨浩天、陆军、黄伟杰 《运输成本、厂商最优规模与长期生产选址》，《产业经济评论》2022 年第 3 期。

③ Porter M. E., *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Nations*, New York: Free Press, 1990.

的高级要素。为配合美国设厂，台积电等头部企业被迫成建制地输出上千名掌握核心工艺的骨干工程师，并同步转移 2nm/1.4nm 等先进制程技术。半导体制造高度依赖深植于工程师经验与团队协作中的“隐性知识”，当这些人与技术被物理剥离，台湾本土的知识积累就被打断，这不是简单的产能溢出，而是连根拔起式的根系移植。另一方面，台湾半导体产业的竞争力很大程度上源于新竹、台中、台南科学园区构建的“一小时产业圈”。在这个范围内，聚集了从 IC 设计、光掩模、特种气体、精密设备维护到封装测试的完整供应链，这种基于地理临近的紧密网络，是知识溢出、信任建立与敏捷创新的重要载体，是竞争对手短期内无法复制的“非贸易性优势”。核心企业的被迫分散布局，物理上撕裂了原本紧密的产业网络，使得产业集群的整体效能大打折扣。随着先进制程在美国落地，台湾在全球供应链中的角色将从不可或缺的全球芯片制程中枢，逐渐退化为可被替代、依赖外部指令的高阶代工节点，这不仅意味着台湾将丧失对全球产业链的议价权，同时也进一步加剧二元结构困境。

三、实证检验与趋势展望

（一）基于 VECM 的电子产业与传统产业动态关联分析

为探究电子产业与传统产业出口的动态关联机制，本研究构建了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M）。基于 AIC 准则确定 VECM 差分滞后阶数 $k=2$ ，引入中美 GDP、电价及汇率变动作为外生控制变量。采用 Johansen 协整检验方法对系统进行处理，由于 ADF 检验明确显示各变量具有单位根特征（ $I(1)$ ），且经济理论表明高科技部门与传统部门在资源约束下存在长期的结构性关联，因而根据非平稳假设与经济理论，将协整秩设定为 1（ $\text{Rank}=1$ ）以确保模型能够捕捉到两者之间长期稳定的均衡约束。归一化后的协整向量显示，电子产业出口与传统产业出口之间存在显著的负向长期关联，电子产业出口每提升 1%，传统产业出口的长期均衡水平显著下降 4.46%（ $p < 0.01$ ），此负向协整关系为“资源挤出效应”提供了坚实依据。

为探究电子产业扩张对传统产业的短期冲击路径，进一步对脉冲响应进

行分析。图 1 展示了给予电子产业出口一个标准差的正向冲击后，传统产业出口在未来 10 个季度的响应轨迹。从中可以看出，在冲击发生的第 1 个季度，传统产业出口即呈现出断崖式的负向响应，响应值迅速下探至约-0.38，反映出电子产业的扩张具有极强的资源吸纳能力，能在极短时间内对传统产业形成资源争夺。阴影区域清晰地表明，这种负向抑制效应具有显著的持续性，大约持续 8 个季度才逐渐回归均衡。统计结果显示，在冲击发生后的短期内（第 1-3 季度），平均响应强度高达-0.2275。意味着在控制了汇率及外部需求的影响后，电子产业的扩张依然对传统产业产生了显著的“资源挤出效应”，验证了在土地、电力、人才等要素供给有限的情况下，高科技产业的繁荣确实对传统制造业构成了实质性的挤压，也意味着台湾产业极化将持续固化。而产业极化的固化使得台湾经济的抗风险能力进一步下降，对电子产业出口的高度依赖，将使得台湾经济更易受外部地缘政治冲击，地缘依附的深化又将进一步迫使半导体产能外迁，最终形成产业极化固化—地缘依附深化—经济空心化的恶性循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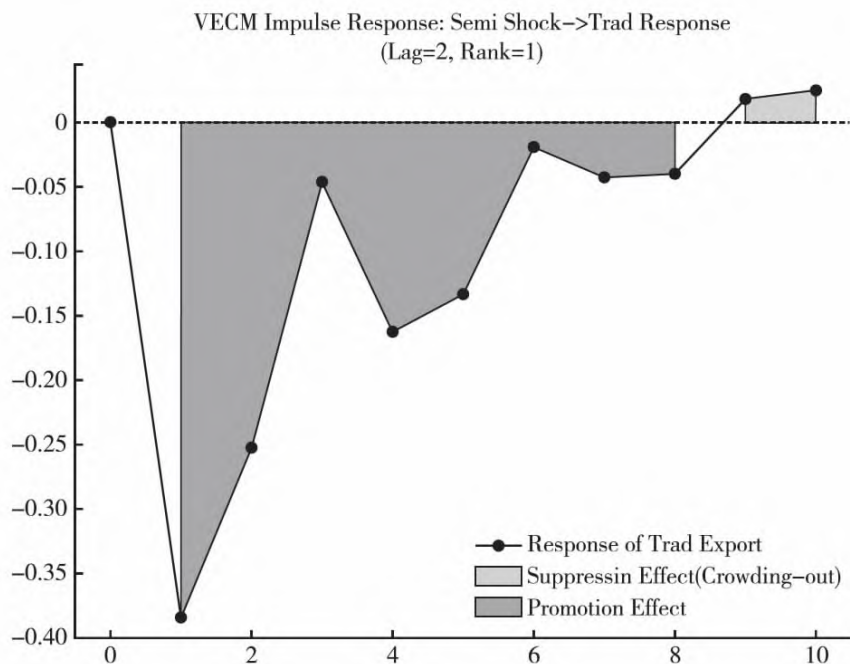


图 1 台湾地区电子产业出口冲击对传统产业出口的脉冲响应

基于 VECM 模型的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如表 3 所示，检验结果显示，P 值为 0.0000，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即在统计上证实了电子产业是导致传统产业格兰杰波动的原因，而非相反。证明电子产业的扩张很可能是导致传统产业波动的主要外在驱动力。结合脉冲响应的负向结果，可以确立从电子产业到传统产业的单向、负向因果链条。此外，VECM 模型能够通过误差修正项揭示系统偏离长期均衡后的调整速度。模型估计出的电子产业调整系数为 0.0404，传统产业调整系数为 0.0345，反映出电子产业的调整速度要快于传统产业，也揭示台湾产业结构的二元分化现状，电子产业作为主导部门，对市场失衡和资源信号的反应更为敏锐和迅速，能够主动进行调整以维持其增长路径，传统产业则相对迟缓，更多地表现为被动适应外部冲击和资源环境的变化。这种调整能力的差异，进一步加剧了传统产业在资源竞争中的劣势地位。

表 3 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

检验方向	F 统计量	P 值	结论
电子产业→传统产业	11.707	0.0000	拒绝原假设
传统产业→电子产业	2.845	0.065	不拒绝原假设

（二）台湾经济成长趋势分析

VECM 模型揭示了电子产业对传统产业存在显著的资源挤出效应（脉冲响应为负）。这一结果在长周期的历史数据中得到了完美的现实印证。依据台湾地区经济统计部门统计的制造业四大行业生产指数（2021 年 = 100），图 2 揭示了台湾制造业内部长达 25 年的结构性变迁轨迹，台湾制造业呈现出显著的“路径分离”与“极化增长”特征。资讯电子工业从 2000 年的低基数（约 15）起步，呈现长周期的指数级攀升，尤其在 2019 年后，受全球数字化转型及 AI 算力需求爆发的驱动，电子工业与其他产业发生了实质性的“脱钩”。尽管 2023 年受周期性影响短暂回撤，但 2024–2025 年以近乎垂直的斜率创下历史新高（逼近 140 点）。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三大传统产业的集体失速。民生工业长期波动下行，反映出纺织、食品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外迁后的空心化实质。化学工业与金属机电工业在 2022 年后呈现出明显的下行拐

点，在 2024–2025 年电子业再创新高之际，两大行业指数却受困于 80–90 的收缩区间。综合来看，2020 年是台湾产业发展的分水岭，此前四大行业虽有增速差异，但大体维持同向波动，此后“电子独涨、传产普跌”的剪刀差形态被彻底固化。如 VECM 模型中脉冲响应所示，电子产业的每一次爆发（如 2019 年后），都伴随着传统产业的相对停滞，印证了资源挤出效应的现实存在。根据模型所反映出的长期负向协整关系，可以预料到只要 AI 算力需求持续推动电子产业增长，传统产业将长期陷入持续停滞，“K 型分化”将长期固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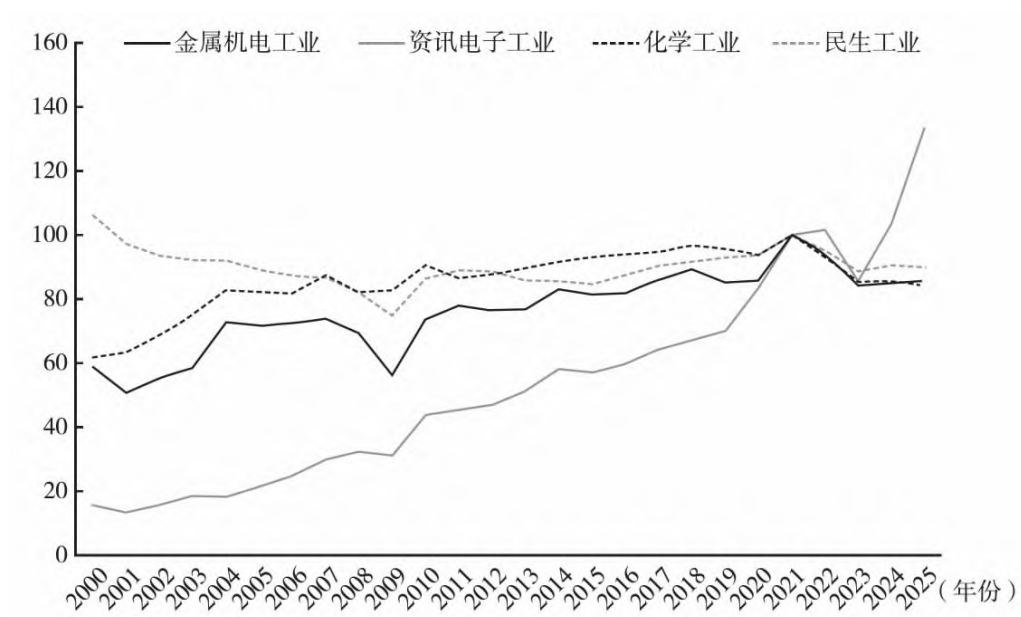


图 2 2000–2025 年台湾制造业四大行业生产指数演变趋势

经济增长的最终目的是提升居民福祉，但台湾产业发展的极化特征已严重阻断了这一传导机制。图 3 对比了 2002–2024 年制造业劳动生产力指数与名义平均薪资指数（2002=100），图中最显著的特征在于电子零组件制造业内部的极端背离。受益于摩尔定律驱动的技术迭代与巨额资本投入，电子零组件业劳动生产力指数呈现出线性攀升轨迹。截至 2024 年，该指数已突破 530 点，人均产出效率较 2002 年提升了 4.3 倍，而同期该行业的名义薪资指

数仅升至约 250 点，两者之间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分配缺口”。这种“产出高成长、薪资慢慢跑”的现象，证实了高科技产业属于典型的“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也决定了其超额收益大部分将持续转化为资本回报而非劳动报酬。相较于电子产业的剧烈分化，制造业整体薪资指数 2024 年仅为 170 点，若扣除 2002-2024 年间累计约 30% 的通货膨胀影响，实质薪资增长微乎其微。对于广大的传统制造业从业者而言，不仅未能分享到高科技爆发的红利，反而陷入了生产力停滞与实际收入增长乏力的低水平均衡陷阱。这种分配断层的持续侵蚀了社会内需增长的基础，不仅引发结构性社会矛盾，也将长期制约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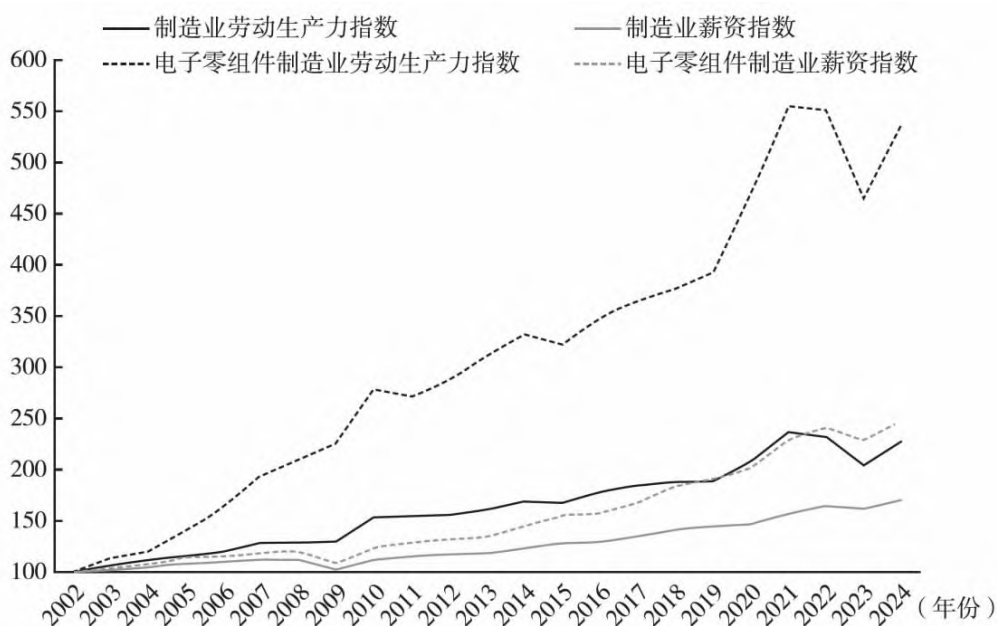


图 3 2002-2024 年台湾制造业劳动生产力与薪资指数的非均衡演进

四、结论与启示

基于 VECM 模型的实证分析表明，电子产业每提升 1% 的出口，将长期挤出传统产业 4.46% 的出口能力；脉冲响应函数则表明，这种挤出效应具有

强持续性与不可逆性。统计数据清晰地呈现出台湾经济“K型分化”格局的固化趋势，在电子产业指数级跃升的同时，化学、金属、纺织等传统制造业长期陷于萎缩区间。更为严峻的是劳动生产率与薪资增长的严重脱钩，使得经济增长成果高度集中于资本所有者与少数高阶技术精英，广大工薪阶层陷入“工作贫困”，社会结构日益撕裂。台湾经济在宏观总量繁荣的表象下，已深陷产业极化与地缘依附的双重陷阱，“台湾病”的本质是经济增长逻辑的彻底异化。

2026年第一季度，全球AI算力需求的爆发式增长为台湾经济注入了短期强心剂，一季度GDP同比增长13.69%，创近39年单季最高。赖当局与台积电魏哲家等人借此大肆渲染“台湾经济黄金时代”的叙事，将半导体产业的单点繁荣包装为全域复苏的治理奇迹。然而，深入剖析最新数据与动态可以发现，这种表面繁荣不仅未能治愈“台湾病”，反而加速了病理机制的恶化，使其呈现出“短期脉冲式增长与长期结构性衰退并存”的新特征。

其一，产业与出口的“无根化”增长与空心化加速。魏哲家等人的“不可替代论”刻意回避了产业链强制迁移的政治代价。随着台积电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及日本熊本等地的先进制程产能陆续开出，台湾正经历从“全球制造中枢”向“技术输出与利润收割地”的被动降级。在美方关税大棒（如15%商品关税协议）与地缘高压的双重叠加下，未来台湾的出口数据将呈现极端的“AI单点依赖”。这种“统计上的繁荣”掩盖了传统产业在全球关税壁垒与岛内资源匮乏（缺电、缺人）双重绞杀下的大面积消亡。台湾经济正失去多元化的产业根基，所谓的“经济韧性”已荡然无存。

其二，经济增长的代价被完全转嫁给普通民众，分配断层走向极端。赖当局标榜的“人均GDP超日赶韩”，在微观体感上却是严重的相对剥夺感。未来一段时期，AI热潮带来的巨额美元流入与半导体周边的高薪效应，将进一步推升台湾的房地产与核心生活成本，引发结构性通胀。而占就业绝大多数的传统制造业与服务业，在关税壁垒与内需疲软的夹击下，薪资将面临长期停滞。这种“科技富豪的通胀，底层劳工的停滞”将使得台湾社会的财富再分配机制彻底失灵，阶层固化从经济问题演变为严峻的社会危机。

其三，岛内选战催生财政民粹化，透支未来应对危机的能力。面对不可

避免的社会撕裂与经济停滞预警，赖当局在岛内持续选战的政治周期下，必然将半导体产业创造的有限税收用于短期选票利益的“政策买票”（如普发现金、各类短期补贴），以及迎合美国的巨额非生产性军购。这种短视的政治博弈，将彻底挤占用于电网改造、能源转型、传统产业纾困及教育改革的财政空间。当“保护费”与“选票费”耗尽了台湾的政策储备，一旦全球 AI 资本支出周期见顶或地缘冲突升级，台湾经济将面临“无缓冲、无替代、无退路”的系统性瘫痪。

“台湾病”的本质，是产业极化与地缘依附相互强化形成的结构性困境。在当前岛内政治对立和美国主导的“供应链同盟”加速推进的背景下，台湾经济转型的空间被进一步压缩。要破解“台湾病”的困局，首先需要正视当前的“虚假繁荣叙事”，跳出“以半导体保安全、以安全换生存”的战略迷思，对经济发展范式进行系统性重构。

第一，推动产业生态的多元化与再分配机制改革。在巩固半导体制造优势的同时，必须通过强有力的财政干预，设立“跨域创新基金”，将半导体的超额利润与溢出技术向绿色能源、智慧医疗、高端机械等具备本地根植性的产业转移，打破“创新孤岛”。同时，通过税收杠杆调节财富分配，抑制资本炒作，将经济成果真正转化为全民福祉。

第二，推进要素配置的再平衡。改革被严重扭曲的能源定价机制，降低对高耗能企业的隐性补贴，将财政资源切实投入电网现代化与可再生能源基建；推动高等教育体系改革，鼓励跨学科人才培养，建立更开放的人才引进机制，缓解人力资本枯竭危机。

第三，调整区域合作策略，回归务实的地缘经济逻辑。避免将经济安全完全绑定于单一外部霸权，台湾应深刻反思与大陆“脱钩断链”所付出的巨大代价。在国际格局剧烈变动的当下，减少政治内耗、改善两岸关系，依托两岸共同市场实现传统产业的突围与均衡发展，不仅是降低地缘政治溢价成本的唯一出路，更是台湾重获经济自主性、避免沦为外部势力“以台制华”消耗品的根本前提。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and Evolution Trend
of the “Taiwanese Disease”
——From the Dual Perspectives of Industrial Polarization
and Geopolitical Dependence**

Sheng Jiuyuan and Guo Ruizhao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global supply chain restructuring and escalating geopolitical competition, Taiwan’s economy exhibits a paradoxical coexistence of macroeconomic prosperity and microeconomic structural imbalances. In particular, the recent short-term macroeconomic boom driven by global AI computing power demand has further masked its deep-seated structural crisis. This study defines this as the “Taiwanese Disease” and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its formation mechanism and evolutionary trend from the dual perspectives of industrial polarization and geopolitical dependence. By constructing a Vector Error Correction Model (VECM) and combining it with long-term industrial data, the study confirms that the electronics industry has a significant resource crowding-out effect and asymmetric adjustment mechanism on traditional industries. This “rootless” single-point growth not only fails to generate technology spillover but also exacerbates “innovation silos” and extreme wealth inequality. Simultaneously, geopolitical pressure forces core supply chains to relocate outward through investment and the payment of “geopolitical taxes,” leading to a mutually reinforcing cycle of endogenous stagnation and exogenous distortions. The current “prosperity narrative” cannot conceal the fragility of a single pillar. If a diversified industrial ecosystem is not reconstructed, the distortion of factor allocation is not corrected, and a pragmatic cross-Straits geo-economic strategy is not adopted, Taiwan’s economy may fall into a long-term stagnation and hollowing out abyss due to overspending and social division.

Keywords: Taiwanese Disease; Industrial Polarization; Geopolitical Dependence; Economic Hollowing-out

(责任编辑: 刘匡宇)